

八九學運激進化論析

• 趙鼎新

發端於胡耀邦4月15日的突然去世，以6月4日發生的軍事鎮壓而告終，1989年春天的學生運動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重大悲劇，史稱「六四事件」。然而，這一結局並不是必然的，而是學生運動激進化的結果。

發端於胡耀邦4月15日的突然去世，以6月4日發生的軍事鎮壓而告終，1989年春天的學生運動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重大悲劇，史稱「六四事件」。然而，這一結局並不是必然的，而是學生運動激進化的結果——激進化肇始於學生的絕食。

4月27日，抗議《人民日報》「4.26社論」的遊行把學運推向高潮^①。遊行的成功證明了官方強硬話語的無效，而中國政府在此階段仍想避免對學運採取鎮壓方式，於是讓步便成了一種選擇。在當日遊行仍在進行時，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表達了政府想和學生對話的意圖。28日，《人民日報》和其他主要報章以略帶肯定的調子在頭版報導了遊行。29日後，政府與學生進行了數次對話。

5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會見亞洲開發銀行代表時，正面地評價了學運，凸顯了政府的妥協姿態，有迹象表明學運會平和收場。然而，正是在這樣一種有可能見好就收的環境下，13日下午，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突然開始絕食。絕食初期，政府

官員、學生領袖和知識份子之間進行了頻繁的接觸和對話，試圖在15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Mikhail S. Gorbachev) 訪問北京前能敦促學生撤離廣場，但這些努力都沒有成功。此後，參加絕食的人數迅速上升，數百萬同情者湧向廣場，學生運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但這同時也為其悲劇性收場埋下了伏筆。

通過對絕食初期政府官員、學生和知識份子之間互動的一些關鍵過程的重構，本文將為讀者展現八九學運在中國政治環境下的發展特徵和面對的困境。

一 絕食前的政治環境

「4.27遊行」後政府態度的改變，使得大部分學生領袖願意對政府做出一定的妥協。4月30日，早先產生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舉行了會議。鑒於政府可能不會同意與高自聯直接對話，與會學生接受了王超華和封從德的提議：組織一個獨

立的對話代表團^②。5月3日對話團舉行了第一次會議^③。此後，對話團與政府數度接觸，政府同意展開對話^④。10日左右，政府甚至與對話團成員討論了對話的技術細節，要求對話團把正式對話成員削減到二十人。12日晚上，第一次對話時間也確定了，計劃在15日進行。然而就在第二天，絕食開始了。

關於絕食的緣起，存在着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中國政府後來的官方說法聲稱是趙紫陽的「5.4講話」鼓勵了激進學生，從而引發了絕食^⑤。另一方面，一些學運積極份子則強調是政府挑起了絕食。在他們看來，包括趙紫陽在內的政府領導人的妥協姿態，只不過是為了拖延時間，待運動平息下去再與學生秋後算賬^⑥。這兩種看法都與事實相去甚遠。趙紫陽的講話肯定沒有為絕食推波助瀾，而當時大多數學生也沒有覺得政府這麼做僅僅是在玩弄手法。絕食在很大程度上緣起於政府的妥協分化了學生，導致了運動的衰落和學運組織內部矛盾的加劇，使得一部分學生為挽救學運而採取了極端行動。

這時期的學運領袖可以分為三個群體。第一是對話團，其成員期待着即將到來的對話。對話團的領袖也在公開地或私下地同政府接觸。他們知道對話即將舉行，因此所持的立場最為溫和。

第二是部分高自聯成員，比如王超華和周勇軍。這些學生定期參加高自聯會議，有時與對話團成員互相參加對方的會議。由此，他們大致了解對話團及其活動。但是，這兩組學生也有分歧。對話團的學生認為，當前的運動已經到了以對話取代遊行和罷課的階段，因此對話團應在學運中發揮主導作用。高自聯的學生則認為，

沒有他們的努力哪有對話團的今天^⑦。在這一分歧下，對話團的領袖把與政府的接觸看作是自己的特權，並經常對此進行保密；而高自聯的領袖則不想讓對話團成為學運的代言人，經常撇開後者，不斷提出與後者的設想完全不同的建議和要求，導致政府不知道應當同誰打交道。儘管如此，對於對話團與政府的接觸，高自聯成員多少是知情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認為，當前運動的重點應當放在鞏固校園民主上^⑧。因此，這些高自聯領袖也不是十分激進。

第三個群體可稱之為魅力型領袖，如王丹和吾爾開希。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在或曾在高自聯擔任過常委，但他們一般不參加高自聯會議，因此對政府和對話團之間的接觸了解甚少。比如，在筆者的採訪中，王丹指直到絕食開始後，他才知道有對話團的存在^⑨。在他們的眼裏，政府在與學生對話這個問題上沒有顯示誠意，而學運本身正處於即將平和收場的危機之中^⑩。

5月4日以後除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之外，北京所有大學開始復課。即使在北大，激進學生也不得不在教室前設立糾察線以阻止學生回到課堂^⑪。北大三角地自學運以來一直人頭湧動，但此時卻失去了往日的風光。一些學生領袖不得不在三角地通過不斷發表演講來維持學生對運動的興趣^⑫。在此背景下，王丹、吾爾開希和其他四位學生於11日晚上在一家餐館聚會，認定學運已經面臨危機，而政府卻在拖延時間^⑬。於是，吾爾開希建議發起絕食^⑭。13日下午，約三百名絕食志願者進入天安門廣場，其中約二百五十人來自北大^⑮。儘管柴玲不是絕食的發起者，但她在動員北大絕食學生時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趙紫陽的「5.4講話」沒有為絕食推波助瀾，當時大多數學生也不覺得政府的妥協姿態僅是在玩弄手法。絕食在很大程度上緣起於政府的妥協分化了學生，導致了運動的衰落和學運組織內部矛盾的加劇，使得一部分學生為挽救學運而採取了極端行動。

並奠定了其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指揮部中的核心地位^⑩。期間，高自聯成員曾試圖阻止絕食行動，但徒勞無功^⑪。

二 政府、學生和知識份子互動的失敗

獲悉學生準備絕食後，政府方面馬上做出了反應。5月13日一早，中共統戰部部長閻明復會見了周舵、鄭也夫和其他一些知識份子，請他們召集學生領袖和一些在學生中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在當天下午開個緊急會議。隨後，周舵打電話給劉曉波，而鄭也夫則去尋求陳子明和王軍濤的幫助。需要說明的是，在1980年代後期，北京一些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份子通過拍攝電視紀錄片《河殤》、展開「球籍討論」、撰寫社會批判型報告文學，以及深入各高校作講座等方式，在社會上豎立了廣泛的危機意識和批判精神，為學運的發生做出了思想準備^⑫。

但是在學運開始後，這些知識份子並沒有像後來政府所指控的那樣充當「黑手」，而是為了避嫌，與學運保持了距離。由於知識份子並不清楚學運組織和領袖的具體情況，他們只能闖到各高校找人。最後劉曉波把北師大的吾爾開希和梁二及北大的王超華帶到了統戰部^⑬，鄭也夫與陳子明和王軍濤則在去北大撲空後，前往中國政法大學通過陳小平找到了對話團人士，並最後帶着項小吉、沈彤等六位同學去了統戰部。同時，剛剛到達廣場準備絕食的王丹、柴玲、封從德也被叫到了統戰部^⑭。

在當日下午的會議上，閻明復首先講話。他告訴與會者，這次會議的目的，首先是了解學生和知識份子的

想法，其次是說服學生在戈爾巴喬夫到訪之前撤出廣場。接着，從吾爾開希和王丹開始，學生依次表達了對運動和絕食的看法。概言之，他們強調其行動是合法的、和平的、愛國的，其大多數人都歡迎政府最近態度的轉變，但同時也指責政府缺乏誠意，希望政府公開修正《人民日報》「4.26社論」的論調。他們還要求政府與對話團立即展開對話；還有一些人要求政府承認高自聯，並懲罰在「新華門事件」中毆打學生的警察。

閻明復對學生的講話作了答覆，其要義如下：首先，他指出學生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它的到來表明國家在各個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問題，中央對此也有很大的緊迫感。其次，「4.27遊行」之後，中央考慮了學生的要求，並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求同存異的方法加以解決。再者，對話對政府來說可以接受，但由於缺乏透明度，使得學生懷疑政府的誠意，政府應當作自我批評。閻明復最後講到，中國正處於從封閉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整個社會都充滿了矛盾和衝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各方面的建設性努力。絕食並非一個不合法的行動，但中央擔心絕食有可能同戈爾巴喬夫的訪問發生衝突。因此，中央希望學生能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能夠以歷史責任感來節制自己的行為^⑮。閻明復的講話在會上受到了廣泛歡迎。

此後各知識份子開始發表意見。與學生相比，知識份子的意見相對集中，在對學運表示支持的同時，也希望學生能撤出廣場，給政府一個機會。會議延續了三個多小時，最後，閻明復發表了如下意見：他將把學生的想法如實向黨中央匯報，並爭取學生與政府盡快對話；同時，他希望學生的行為在戈爾巴喬夫到訪期間能夠

在1980年代後期，北京一些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份子通過拍攝電視紀錄片《河殤》、展開「球籍討論」、撰寫社會批判型報告文學，以及深入各高校作講座等方式，在社會上豎立了廣泛的危機意識和批判精神，為學運的發生做出了思想準備。

有所約束，並承諾政府絕不「秋後算賬」。閻明復最後坦誠地指出，要政府立即就公開否定「4.26社論」有一定的難度，但是能否改變其定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學生在這幾天的作為，學生要給他們所認為的中央改革派一個機會、一點時間²²。

閻明復的坦誠受到了大部分與會者的歡迎。會議結束時，吾爾開希和王丹向大家保證學生一定在5月15日之前撤離廣場。雖說閻明復的講話贏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他卻沒有說服所有人。在會議剛開始不久，兩名絕食領袖柴玲和封從德告訴身邊的學生他們在廣場有事要做，然後悄然離席。閻明復的講話顯然沒有對他們產生影響。

這天晚上對許多人來說是不眠之夜。比如，政府官員李鐵映、李錫銘和陳希同在凌晨2點30分來到廣場勸說學生離開，結果被學生轟走。又比如，王超華反覆穿梭於廣場和統戰部之間，一邊試圖勸說學生撤離，一邊與政府官員接觸，爭取學生與政府能迅速對話。

5月14日一大早，閻明復與學生領袖王超華、王丹和吾爾開希再度會面。閻明復告訴他們，政府已經同意與學生對話。政府方面的代表包括李鐵映、閻明復、羅幹和國務院的十位副部長。王丹和吾爾開希馬上指出政府代表團的成員級別不夠高。閻明復回答說：「李鐵映是國務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我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難道這樣的級別還不夠嗎？」三位學生於是便沒再說甚麼。接着，他們開始討論對話的細節。最後，三位學生提出對話要在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閻明復說，這很難實現，統戰部沒有這樣的設備，而中央電視台的設備都用來準備戈爾巴喬夫的訪問了。三位

學生領袖說，如果不能現場直播，他們將無法說服絕食的學生。最後，閻明復同意，「可由中央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對會議進行攝像……並在晚上進行完整的直播。同時，學生們也可以自己錄製會議全過程，並在天安門廣場播放。」三位學生接受了這一安排。但是隨後，北京謠言四起，說中共不同意現場直播對話是因為電視台的設備被用於轉播巴西足球隊的球賽²³。電視台的設備用於準備戈爾巴喬夫的訪問和轉播一場球賽，這兩者在百姓的眼裏相去甚遠。

一切談妥後，三位學生領袖反而當着閻明復的面嘀咕了起來。閻明復顯然明白他們的猶豫所在，於是指出：「無論學生是否撤離廣場，中央都已經決定不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現在，決定權完全掌握在學生手中。而且，即使你們決定撤離，你們一定能把學生帶離嗎？」據王超華說，他們立刻想像到如果不能把學生帶離廣場將會招致的後果，於是就當着閻明復的面開始討論如何設法把學生帶離廣場。期間，

儘管一些政府官員和學生為對話的實現做出了艱苦努力，但對話從一開始就顯得混亂不堪。首先，不管自己是否被選為對話代表，對話團的每個成員都想參加會議。結果，對話團有超過四十名成員與會。



學生絕食

儘管學生一直要求與政府對話，但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做好準備。大部分學生代表在幾天前還互不認識，更談不上甚麼共識和協調。驟然曝露在這個他們視為歷史性時刻的閃光燈之下，許多人甚至無法保持常態。

王超華甚至指責王丹和吾爾開希所發起的絕食是一次不負責任的行動。王超華還問王丹是否真能說服柴玲和其他學生離開。思忖片刻之後，王丹回答說，如果一些有威望的知識份子能夠前去勸說，學生一定願意離開。接着，王超華說，她知道有一些知識份子將在下午開會，她可以去請他們出面幫助²⁴。

王超華所提到的這次會議的組織者是《光明日報》記者戴晴²⁵。她請來了十個人，包括嚴家其、蘇曉康、包遵信、劉再復和李澤厚等。就在會議開始之前，王超華跑了進來。稍後，溫元凱帶着幾個私營企業家不期而至。會議大約在下午2點開始。此時，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數已經暴增至近三十萬人，愈來愈多的學生加入絕食行列²⁶。王超華的到來改變了會議的主題。在會上，王超華哭着懇求學者運用其影響力說服學生離開廣場。許多知識份子也哭了起來，同意擔當這項任務。蘇曉康還起草了一份《緊急呼籲》，準備在廣場上宣讀。

大約下午4點45分，當十二名知識份子仍在開會的時候，政府和學生的對話在統戰部會議廳開始。會議廳的布局完全按照對話團團長項小吉的要求布置：整個廳中間設一張長桌，十三名政府代表坐在一邊，同樣數目的對話團代表坐在另一邊，以表示其地位的對稱。對話學生的身後是其他對話團代表和部分絕食學生。會議廳的兩側是報社和電視台的記者²⁷。

儘管一些政府官員和學生為對話的實現做出了艱苦努力，但對話從一開始就顯得混亂不堪。首先，不管自己是否被選為對話代表，對話團的每個成員都想參加會議²⁸。結果，儘管計劃是二十人，但事實上，對話團有

超過四十名成員與會。其次，絕食的學生並不信任對話團，他們派觀察員坐鎮。在對話剛開始，吾爾開希就讓北師大絕食參加者程真朗讀了〈給媽媽的一封信〉。她聲情並茂的朗讀使得在場的大部分人，包括記者和政府官員，都聲淚俱下。對話因此變得非常情緒化²⁹。第三，儘管學生十多天來一直要求與政府對話，但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做好準備。大部分學生代表在幾天前還互不認識，更談不上甚麼共識和協調。驟然曝露在這個他們視為歷史性時刻的閃光燈之下，許多人甚至無法保持常態。發言人一個個長篇大論，但其內容卻常常風馬牛不相及；未被選為發言人的學生要麼徑直發言介入對話，要麼不停地遞條子催促發言人提出他們認為更為重要的問題。學生代表甚至為搶麥克風而打鬥了起來。

更有甚者，在對話開始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廣播站就開始廣播：「請大家前往統戰部支援對話學生，那裏有人想出賣我們。」³⁰於是絕食者及其支持者陸續到達統戰部。他們不斷要求項小吉和沈彤出來，提出更多各式各樣的要求。大量到來的學生堵塞了統戰部的大門，結果把往電視台送對話錄像的吉普車堵在了人群之中。當項小吉意外發覺這一情況時，一切為時已晚。這時已經接近晚上7點，而電視台卻仍然沒有播放對話內容，學生於是在統戰部門外大聲叫喊，要求立即終止對話。最後，大約在晚上7點15分，一群學生在王超華的帶領下衝進了會議廳，要求要麼立即直播對話，要麼終止對話³¹。會議廳裏的學生也立即站起來，指責電視台未能播放對話是政府的陰謀。恰在此時，柴玲打開了錄音機，播放起《絕食宣言》。

對話如此收場顯然出乎閻明復所料。閻明復當天正發着高燒，在一片混亂中，他近乎絕望地癱坐在椅子上。

此後北京謠言四起，傳說中共內的保守派如何從中作梗阻止了對話的電視播放，從而破壞了對話，百姓因此群情激憤^⑳。更有甚者，北京的所有大報記者都選擇了對這次對話不加報導。一位被訪者回憶道：對話在混亂中結束，與會記者對學生的表現十分失望。許多記者紛紛跑到學生面前，抱怨他們的表現太差，許多人甚至流了眼淚。同時，他們表示不願意給學生摸黑，不願意給這場民主運動摸黑，因此不願意報導這次對話。最終，這麼一次重大的對話活動竟然沒有一家北京的大報對此作出詳細報導，以至於有些市民根本不知道有這場對話的存在，從而加深了人們在「政府根本就沒有與學生對話的誠意」這一點上的共識^㉑。必須強調的是，這裏並不涉及記者對國家審查制度的顧慮，因為這一制度在當時近乎癱瘓^㉒。

當政府與學生的對話仍在進行時，前面提到的十二名學者來到國務院信訪局與絕食學生代表會面，試圖說服他們把學生帶離廣場^㉓。學生代表表示完全同意「老師」的看法，並邀請他們去廣場與其他學生交談。十二名學者在廣場受到熱烈歡迎。他們在廣場廣播站中宣讀了《緊急呼籲》^㉔，盛讚這次學運，要求政府承認學運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承認高自聯是合法組織，同時提議學生撤離廣場以使中蘇峰會得以順利進行^㉕。這項呼籲雖然受到了學生歡迎，但學生卻沒有撤離。事實上，一些激進學生甚至認為這些學者的真正意圖是幫助政府。李

錄回憶他聽完《緊急呼籲》之後的感受時說^㉖：

聽起來很動聽，他們好像說出了我們的主要要求。但是靜下來一想，我就意識到，他們實際上代表的是政府。中國知識份子總是優柔寡斷。儘管他們口頭上說支持學生，但事實上卻在為政府說話。他們可以說服學生離開廣場，但是他們並沒有能力保證政府以後不會向我們報復。

當學者正在努力勸說學生離開時，柴玲遞給封從德一張條子，上面寫着，「請在廣場廣播站連續宣讀《絕食宣言》三次。」在封從德宣讀《絕食宣言》時，學生的情緒再次沸騰，形勢急轉，失去了控制。他們開始對這十二名學者充滿敵意。據劉曉波說，這些學者在離開時，學生仍不斷對着他們叫罵：「滾出天安門廣場！我們不需要救世主！」、「這是我們的事情！沒有人可以代表我們！」、「我們拋頭顱、灑熱血，你們想坐享其成，做夢去吧！」^㉗

從今天看來，這十二名學者的游說行動失敗是必然的。這些知識份子既沒有五四時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人在革命中所建立的克里斯瑪(charisma)，因而能對該時期在上海的學運進行掌控^㉘，又沒有「一二·九」時期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北方局所掌握的地下組織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因而能將運動發展引導到中共希望的方向^㉙。1980年代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雖然通過自己的著作和校園演講為運動的發起開闢了道路，並贏得了部分學生的尊重，但是那些與知識份子聯繫最為緊密的、對中國的問題和運動的目標有着較深理解的學生，在運

1980年代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雖然通過著作和演講為運動的發起開闢了道路，並贏得了部分學生的尊重，但是那些與知識份子聯繫最緊密、對中國的問題和運動的目標有着較深理解的學生，在運動中的地位卻一天不如一天。

對鄧小平和其他中共高層領導人來說，學生佔領着天安門廣場無疑是對他們的一個極大侮辱。同時，學生的行為也表明早先溫和路線的無效，導致像楊尚昆、喬石這樣的原先支持溫和策略的高層人士改變了態度，為中共決心鎮壓鋪平了道路。

動中的地位卻一天不如一天，不斷讓位於那些對1980年代的自由化思潮了解很少，但卻在學運中通過激進行動而獲得地位的學生^②。而且，因為害怕受到迫害，一些主要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在運動一開始就與學生刻意保持距離，不少人直到5月13日才在政府的邀請下作為斡旋者捲入了學運。他們曖昧的立場進一步削弱了他們本來就很微弱的影響。

絕食的繼續不但使對話團和高自聯在學生中失去影響，即使是像吾爾開希和王丹這樣的絕食發起者，其作用也趨於式微。吾爾開希和王丹都在一定程度上把絕食看作是一次政治行動。對他們來說，戈爾巴喬夫訪華是推進學運、迫使政府做出更多讓步的良機。但對其他絕食學生而言，絕食只是一種表達方式，或是一次通過自我犧牲來改造中國的機會。他們不太關心戈爾巴喬夫的國事訪問，也不努力去利用隨之而來的大批外國記者所提供的機會^③，而只是決心將絕食進行下去，直到政府完全接受他們的要求。絕食的性質（這裏指為此所需的個人身體上的犧牲）決定了參加絕食的學生大多屬於後者。因此，儘管吾爾開希和王丹在發動絕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由於他們在與政府打交道時表現出了靈活性，使得他們在其他絕食學生中的威望下降。5月14日晚上，吾爾開希就是因為試圖勸說學生撤出廣場而被轟走。

絕食開始之後，真正控制廣場的是柴玲、李錄、封從德、張伯笠這樣的「理想主義者」。「獻身」、「改革需要犧牲」、「中國需要第二個譚嗣同」、「直面死亡，我們為生存而戰」等類似的標語成了絕食學生的主流話語；一些絕食學生甚至拒絕喝水並計劃自

焚。此後幾天，外地學生大量抵京；累垮的走了，精神抖擻的來了，天安門廣場成了一個十分有利於激進學生的場所。保持激進因此也成了學生領袖維持在廣場中影響力的唯一砝碼。

就這樣，直到5月15日戈爾巴喬夫抵京，學生仍然佔領着天安門廣場^④。戈爾巴喬夫訪華是中蘇之間三十年來的首次國事訪問，它標誌着兩國間敵對關係的正式結束。因此，在媒體上，這次訪問一直被描述為重大外交突破。然而，由於天安門廣場被佔領，對戈爾巴喬夫的歡迎儀式不得不在北京機場進行，國家主席楊尚昆同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的會談也被耽擱了兩個小時，不少活動更被迫取消^⑤。對鄧小平和其他中共高層領導人來說，學生的行為無疑是對他們的一個極大侮辱。同時，學生的行為也表明早先溫和路線的無效，導致像楊尚昆、喬石這樣的原先支持溫和策略的高層人士改變了態度，為中共決心鎮壓鋪平了道路。

三 結語

5月13、14兩日對八九學運的發展有着關鍵意義。13日下午絕食者到達廣場時僅三百來人，包括支持者在內，人數也不超過三千。當時相當一部分學生和市民都不支持和不理解這場絕食^⑥。政府方面在絕食的起步階段也做了巨大的努力，試圖能在戈爾巴喬夫到訪之前結束絕食。同樣，知識精英和持溫和立場的學生領袖也想迅速結束絕食。因此，學生、知識精英和政府之間出現了很多接觸。

然而，儘管一些學生領袖、知識份子和政府高層官員都表現出了很大的誠意，絕食卻未能終止。5月15日，絕食人數超過了三千，送絕食學生去醫院的救護車警笛響徹北京，學生和市民迅速地對絕食轉向同情。此後的幾天裏，包括一些傳統意義上的政府骨幹力量，如中低級官員、警察和解放軍軍官，每天有數百萬的同情者湧向廣場。整個學運因此取得巨大成功，但同時引發了政府危機，導致了趙紫陽的下台和戒嚴的實施，造成了廣場學生騎虎難下的局面，為運動的血腥收場埋下了伏筆。

關於學運的悲劇性收場，中國政府事後將此歸咎於兩個原因：一是趙紫陽的「5.4講話」助長了學生的氣勢；二是學運受到了「黑手」或者說國內外反共勢力的控制^④。筆者對於絕食的研究不能支持這兩個觀點。事實是，除了小部分極端學生外，當時大多數學生都對趙的講話表示滿意。此後，絕大多數北京高校開始復課，大多數學生對學運不再關心。總而言之，政府的讓步，包括趙的講話，成功地分化了學生，而絕食正是被這一成功的策略逼出來的。關於學運背後的「黑手」，這一問題比較複雜。當時確實有許多老師、社會人員和國家幹部帶着不同目的為他們所認識的學生出謀劃策，但都是無組織的個人行為。他們給學生出着不同的主意，不同高校和專業的學生則接受着不同的「指點」；再加上學運組織混亂，學運領袖之間互不賣賬，結果是眾多力量相互抵消。從本文對絕食期間北京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介入學運失敗的分析可以看出，在5月中旬，即使是在學生中最有影響的知識份子，也沒有影響學運的能力。

相反，八九學運後，我們聽到了大量譴責學生的聲音，認為學生不負責任的行為對學運的悲劇性收場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譴責似乎有一定道理。從5月13、14日學生與政府的互動來看，學生的表現的確不盡人意。而且，在5月下旬軍事戒嚴後，激進的學生繼續堅持不撤離廣場，從而導致了鎮壓。問題是，這種看問題的方法有事後諸葛亮的味道。比如，5月14日的對話失敗後，北京的記者因為學生表現太差而不報導這場對話，這種做法對遏制學運往極端方向的發展沒有助益，但是我們能僅僅因為沒有如實報導對話這一歷史性事件而讓他們擔當六四悲劇這一歷史責任嗎？學生絕食後，北京謠言四起，形勢一直不十分明朗。當時大量很有閱歷的知識份子時常都顯得很天真，要讓初出茅廬的學生對運動有個清晰的評估並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作為行動者的歷史地位，是否有些要求過高？

更何況，從本文對5月13、14日學運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是像吾爾開希和王丹這樣富魅力的學生領袖，他們一旦轉向支持妥協性策略，馬上就會在學運中被邊緣化。柴玲、李錄和封從德可以說是廣場極端學生的代表，因此也就受到了更多的譴責。但是，他們也曾想結束絕食^⑤，並在5月下旬帶領學生撤離廣場。與其他學生領袖不同的是，他們清楚地知道，其妥協性行為只會導致他們在廣場影響力的邊緣化^⑥。總之，八九學運的領袖，特別是早期的積極份子，大多數不十分極端，但是他們卻因為不能在學生中建立起權威而頻繁地被替換，使得激進學生不斷取代了更具理性的學生，使得學運領袖愈來愈清楚保持激進才是他們保持影響力的關鍵。顯

中國的政治環境不容許獨立於國家的社會組織的存在，一旦出現八九學運這樣的政治危機，當政府需要有人與之對話時，它卻連一個具有談判能力的對象也找不到，這就是悲劇所在。

近二十年中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導致八九學運悲劇性下場的許多結構性條件在中國仍然存在。回想謠言在2008年圍繞着「楊佳襲警事件」和「甕安事件」中所產生的作用，這一切難道還不夠發人深省嗎？

然，弄清楚甚麼是激進學運領袖得以主導運動發展的結構性條件才是關鍵所在。

首要的結構性因素在於學運組織力量的微弱。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制度並不容許獨立於國家的社會組織存在，當時的學運領袖和組織都是在瞬時中得以湧現。這就導致了學運組織力量的微弱，學生中意見林立而政府無所適從；學生領袖之間缺乏互信，學運組織對學生只有動員能力而沒有節制能力，以及學運領袖的頻繁替換和更具理性的學生領袖在學運中的邊緣化。威權國家平時限制獨立於國家的社會組織的發展，但是一旦出現八九學運這樣的政治危機，當政府需要有人與之對話時，它卻連一個具有談判能力的對象也找不到，這就是悲劇所在。

對政府缺乏基本信任則是學運悲劇性發展的另一個關鍵。在1980年代的中國，中共長期實行的極左路線給社會和個人所帶來的駭人聽聞的災難正在不斷被揭露，西方世界的優越物質生活為貧困的中國大眾所嚮往，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再為大眾所迷信，國家面臨着嚴重的信仰危機。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政府的妥協被解讀成陰謀，政府官員的不同聲音被放大解讀為黨內的兩派鬥爭，而對政府最為不利的謠言則成了決定大眾輿論的關鍵，社會就這樣喪失了妥協機制。面對此起彼伏的抗爭活動，中共只剩下兩個選擇：其一是進一步妥協，結果當然是尾隨日後「蘇東波」的道路；其二則是採取鎮壓。在當時，中共實權派領導大多數為長征幹部，他們中沒有人會容許共產黨體制在他們手中垮台，於是就釀成了悲劇。

八九學運轉眼二十年。這二十年中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是導致八九學運悲劇性下場的許多結構性條件在中國仍然存在。回想謠言在2008年圍繞着「楊佳襲警事件」和「甕安事件」中所產生的作用，這一切難道還不夠發人深省嗎？

註釋

① 一開始，中國政府對學運的反應比較謹慎。在這個階段，中共高層中似乎沒有人對這場運動有一個清晰的了解。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後，北京學生發起了全市罷課，政府態度也趨於強硬。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社論的言辭激怒了學生，引發了27日的大遊行。

② Tong Shen and Marianne Yen, *Almost a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0), 215; 封從德的發言，參見《回顧與反思》(德國：德國萊茵筆會、亞琛八九學社，1993)，頁68。

③ 對話團的規模有七十來人。多數大學(包括北京大學)的對話團代表都是在小圈子內決定的，許多學生既沒有經過選舉，也沒有受到邀請，而是聽到消息後不請自來的。

④ 關於政府如何通過大學校方與對話團接觸，參見Tong Shen and Marianne Yen, *Almost a Revolution*, 229-31。

⑤⑥ 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載吳牟人等編：《八九中國民運紀實》，下冊(美國，1989)，頁959-87。

⑥ 筆者訪談的幾個激進學生和知識份子都表達了這種觀點，1993，北京。

⑦ 關於這兩個團體的學生領袖之間關係的更多討論，參見王超華：〈我所知道的對話團〉，《中國之春》，1992年第7期，頁15-17。

⑧ 高自聯5月6日的公告就反映出這種溫和態度：「民主化是一個漸進

的過程。高自聯將不再把遊行當作推進中國民主的一個主要手段。在隨後幾天，我們的第一步是組織講座和討論，並邀請著名學者如嚴家其和于光遠來做講座……第二步是辦報紙和雜誌……〔關於學生和政府的對話〕，我們將持靈活態度。對話可以通過第三方來與政府進行，也就是通過對話團。〕參見吳牟人等編：《八九中國民運紀實》，上冊（美國，1989），頁180。據王超華的記憶，5月11日，高自聯決定：「考慮到政府目前對對話所持的積極態度，高自聯應當反對任何大規模的示威行動，同時支持各類中小規模的行動。」王超華的發言，參見《回顧與反思》，頁94。

⑨ 筆者對王丹的採訪，1993，北京。

⑩ 這一時期激進學生的心態可以從5月7日的一張大字報中得到反映：「學生民主運動虎頭蛇尾，沒有任何收穫地歸於平靜……人民對我們懷着巨大希望，我們也得到了高度的讚揚和支持，但是我們何以為報？……有人打我們的臉（比如說我們是陰謀、動亂），然後再安慰我們以蜜棗（比如，說年輕人是愛國的）。於是，我們就忘記了疼痛，並開始享受蜜棗。」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91），頁153。

⑪ 王超華：〈略論學生的群體形象及影響〉，《民主中國》，1992年第10期，頁77。

⑫ 武仁：〈五月風波的起因和發展：第二部分：風波的全過程（研究資料）〉，《青年研究》，1990年第10期，頁1-19；Tong Shen and Marianne Yen, *Almost a Revolution*, 226。

⑬ 柴玲也以此理由支持絕食：「〔5月4日，周勇軍宣布停止罷課之後〕，學運失去了動力；愈來愈多的學生回去上課。關於復課還是繼續罷課的爭論消耗了學生運動的很多時間和資源，形勢愈來愈艱難。於是，我們感到必須發動絕食。」Minzhu Han and Hua Shen, eds.,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7。

⑭ 絕食的意圖與行動在運動中曾多次產生。早在4月5日，一些外地人士到北京鼓動在當日發動絕食（沈彤的發言，參見《回顧與反思》，頁14）；18日，北大的兩名學生曾試圖在新華門前絕食（白夢的發言，參見《回顧與反思》，頁57）。柴玲說：「運動一開始，我們就有絕食的意思。有一天在跟張伯笠聊天的時候，他說：『你知道嗎？絕食是非常有效的〔抗議〕武器……如果真的餓了，可以到宿舍或洗手間悄悄吃些東西。你們是祖國的花朵。一旦校方看到你們在絕食，他們會像對待孩子那樣對待你。』」柴玲的發言，參見《回顧與反思》，頁89。

⑮ 從以下王丹和柴玲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窺視出學生決定在5月13日發起絕食的動機。會後，王丹告訴柴玲：「我們在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前兩天〔開始絕食〕，這樣能給政府以足夠的時間做出反應。」柴玲的發言，參見《回顧與反思》，頁89。

⑯ Tong Shen and Marianne Yen, *Almost a Revolution*, 235-37.

⑰ 比如，王超華代表高自聯試圖說服柴玲取消絕食。柴玲回答說：「絕食是學生自發的。無人有权阻止！」王超華：〈我與十二學者上廣場〉，《華夏文摘》，1993年第12期，頁25。當王指責絕食領袖濫用高自聯的名義動員學生的時候，鄭旭光跳起來反駁說：「你到現在還相信高自聯在學生中有權威嗎？」王超華的發言，參見《回顧與反思》，95。

⑱⑲⑲ 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頁19-47；239-68；115-79。

⑳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頁122；王超華：〈我與十二學者上廣場〉，頁26。

㉑ 關於這次會議的細節，參見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頁99；王超華：〈我與十二學者上廣場〉，頁26；Tong Shen and Marianne Yen, *Almost a Revolution*, 239-40。

㉒ 閻明復的講話轉引自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頁101-109。

㉓ 沈彤在他的書中把此謠言當作事實來描述。參見Tong Shen and Marianne Yen, *Almost a Revolution*, 245。

㉔ 這次會面的描述主要以王超華的敘述為基礎。參見王超華：〈我與十二學者上廣場〉，頁28。

㉕ 這次會議的描述以戴晴的敘述為基礎。戴晴：〈也談春夏之交〉，《華夏文摘》，1993年第12期，頁2-24。

㉖㉗ Lu Li, *Moving the Mountain: My Life in China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iananmen Square* (London: Macmillan, 1990), 136; 138.

㉘ 項小吉：〈為了中國社會之公正〉，《北京之春》，1995年第8期，頁71-77。

㉙ 以下敘述主要以筆者對三位參加對話的對話團成員(第57、58、59號)的採訪為基礎，1993，北京。

㉚ 第59號被訪者指出，該行動是預先準備的。起初他們讓這位被訪者來唸，要求她在讀的時候要聲淚俱下。最後，為了更好地打動聽者的心，他們決定讓一名女絕食者來完成該任務。

㉛ 柴玲的發言，參見《回顧與反思》，頁107。

㉜ 王超華回憶，她進入會議廳是因為她看到許多學生擁擠在統戰部前面喊：「停止對話！立即直播！」她同意把這個信息傳遞進去。兩個學生陪她一起進了會議廳(因為學生不信任她)。所以她不得不採取激進行動。王超華的發言，參見《回顧與反思》，頁102-103。

㉝ 大部分學生都把電視台未能播放錄像看作是政府的陰謀。沈彤認為，對話未能播放是因為一些比閻明復更有權力的人在從中作梗。Tong Shen and Marianne Yen, *Almost a Revolution*, 245. 事實上，這一時期政府對媒體已經基本上失去控制，比這更有煽動性的報導在主要的官方媒體上都隨處可見。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頁269-302。因此，筆者這裏接受項小吉對自己親身經歷的描述。項小吉：〈為了中國社會之公正〉，頁71-77。

㉞ 第58號被訪者的回憶。

㉟ 據第60號被訪者回憶，絕食期間，北京記者經常帶着他們的稿件來到廣場，讓學生過目，提出意見，從而做出修改。在此階段，新聞更多受到的是學生的審查和自我審查。伯林(Michael J. Berlin)同樣注意到5月中旬新聞享有高度自由時，官方媒體的報導常常以有利於學生的方式進行，儘管「打倒鄧小平」、「打倒中國共產黨」之類的口號在運動的早期出現過，很多文章都申明學生從來沒有打出過這類口號。參見Michael J. Berl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Media during the Beijing Spring", in *Chinese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1989: Chinese and American Reflections*, ed. Roger V. Des Forges, Luo Ning, and Wu Yen-bo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263-75。

㊱ 除非特別指出，關於十二名學者的活動主要以戴晴、蘇瑋和舒明的描述為基礎。戴晴：〈也談春夏之交〉，頁2-24；蘇瑋：〈十二學者上天安門〉，《民主中國》，1992年第10期，頁81-84；舒明：〈終於撤離〉，《民主中國》，1990年第2期，頁22-30。

㊲ 這兒有兩種說法。蘇曉康說是溫元凱宣讀這項呼籲(蘇曉康：〈呼喚全民族反省意識——電視系列片《河殤》構想淺淡〉，載蘇曉康、王魯湘編：《河殤》[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頁1-6)，而戴晴則說是她讀的(戴晴：〈也談春夏之交〉，頁2-24)；兩人都位列十二名學者之中。為幫助筆者搞清事實，陳小雅女士重新聽了她當時的錄音，發覺溫元凱和戴晴竟然先後都宣讀了這個呼籲書，可見當時情況混亂。

㊳ 這項呼籲也在中央電視台再度播出，5月15日又刊發在《光明日報》頭版。

㊴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頁122。

㊵ 劉永明：《國民黨人與五四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⑬ 學生領袖行為的不同可以表明這一點。比如，吾爾開希和王丹頻繁地參加新聞發布會和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而李錄、封從德和柴玲則很少參與這類活動。

⑭ 5月15日早上，學生領袖和政府之間還有一次對話。然而，控制廣場的絕食組織者都沒有參加。

⑮ 參見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8; Orville Schell, *Mandate of Heaven: A New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issidents, Bohemians, and Technocrats Lays Claim to China's Fu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85。

⑯ 第3號被訪者自5月15日一直在廣場上當糾察，他的回憶代表了當時學生的一種普遍情緒：「我非常反對絕食的想法……絕食之前，我們已經復課了，好像一切很快都會結束一樣……然而，絕食開始後，政府的反應就實實在在讓我們感到失望。絕食的第一天，政府竟然沒有想辦法驅散絕食的學生，這讓我們都非常吃驚。到第二天、第三天，我們對絕食學生就愈來愈同情了。關鍵就在於同情。許多朋友告訴我說，他們來天安門廣場，正是因為他們被感動了。」

⑰ 5月16日後，鄭義一直呆在絕食指揮部總部。他說當時以柴玲為首的絕食指揮部學生領袖也想結束絕食。但是鄭義做出了如下觀察：「儘管指揮部的領袖們無休止地開會，但是真正的決策權並不掌握在這些……年輕領袖手中……不管甚麼時候，只要向絕食的學生提出結束絕食的想法，回答都是一個很乾脆的『不』。一天晚上，結束絕食在學生領袖中成為主導意見，但這是不可能得到執行的。絕食的學生們懷疑領袖是要出賣自己辛辛苦苦得來的果實，而政府對絕食行為的置之不理也激發了他們奮戰到底的決心……許多學生甚至聲稱，如果指揮部決定結束絕食，他們就立刻自殺。這種拿生命去戰鬥的心態每時每刻都在擴散並趨於激烈。」鄭義：

《歷史的一部分——永遠寄不出的十一封信》(台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70。

⑱ 5月下旬，四百多所大學(不包括大量的中專和職業學校)在廣場擁有營地，他們頻繁開會討論去留問題。但當時廣場上學生的流動性很大，或者說那些認為應當撤離廣場的人已自行離開了，而那些仍然留在廣場的人，則更可能是頑固的激進派和精力充沛的外地新來者。在這種情況下，緩和局面的任何努力都變得十分艱難。根據李錄回憶，是否撤離廣場的爭論每次都是這類會議的首要議題，但是每次與會者中的壓倒性多數均拒絕離開，他們大多都是外地學生。李錄的發言，參見《回顧與反思》，頁303。因此，李錄和柴玲之所以拒絕撤離廣場，很可能是因為這是他們可以做出的唯一選擇。他們如決定撤離，不但決定得不到執行，而且他們也可能因此而被逐出領導層。關於這一點，吾爾開希在6月2日接受香港記者李佩爾的採訪時已經講得很清楚：「我們好多次都想撤離廣場，但每次都改變了決心。比如，5月27日我們曾宣布學生將在5月30日離開廣場，但我們的決定遭到了拒絕。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學生們，尤其是外地學生們，都不願意離開。最後，所有管事的人都必須支持佔領廣場，如果你要學生離開，學生們就會把你拋開。」吾爾開希就是在5月22日一大早因為動員學生撤離廣場而被逐出了學運領導層。王超華亦復如是。由於她一直堅持帶走學生，最後也被排擠出廣場。6月1日，外高聯(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領導連勝德，也因為鼓動學生離開廣場而被罷黜。對於學生領袖而言，保持在廣場上的影響力的唯一途徑就是保持激進立場。李佩爾：〈射下紅太陽——吾爾開希〉，載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1989)，頁211。